

• 经济学研究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 新时代经济全球化

戴翔, 张二震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学院, 南京 211815)

摘要: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有其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客观基础,而国际分工演进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是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构建,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中国将秉持这一新理念,努力走主动型、包容型、共享型、联动型和更加公平合理的开放发展之路,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增长共赢链

中图分类号: F11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8)01-0051-07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内顾倾向明显的“逆全球化”思潮蔓延,有其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客观基础。而国际分工演进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是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构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

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逆全球化成因: 国际分工和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自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就一直存在。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经济

收稿日期: 2017-09-10

作者简介: 戴翔(1980—),男,安徽长丰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张二震,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研究”(16JJD7900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我国外贸增速变化机理及对策研究”(16AJY018)、江苏省“333工程”培养资金资助项目“全球价值链演进新趋势下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举措研究”(BRA2017399)、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南资本市场研究中心”资助项目(17ZD018)的阶段性成果。

根源在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新现象:一是伴随国际生产分割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分工的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全球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实力发生了相对变化。国际生产分割导致生产国际化迅速发展,产品生产的各阶段和环节都“国际化”了。以往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向以“要素”为界限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变,各国以“优势要素”而不是以产品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这种新的可称之为“要素分工”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更加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二是宏观层面的国家红利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红利逐步分离;三是在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加剧了资本和劳动要素收入分配的差距。

第一,由于要素分工的实质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是比较优势从产品层面向要素层面的拓展和深化,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比如,产品价值链的分割为原先在“整件”产品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价值链某特定环节和阶段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具有了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尤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相结合,进一步从改变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层面上创造着比较优势。总之,要素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参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机遇,从而大大提升了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和分配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对此,现有文献已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1]更为重要的是,要素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和产品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加速了发展中国家产业起步和发展速度,缩短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由于这一系列变化,尽管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凭借多种优势而占据着制高点,从而成为全球化红利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国依靠制度优势和正确的战略,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开放中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短时

间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和一些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共同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第二,由于要素分工通过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整合,企业的边界不断突破国家边界,从而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征,其“国籍”特征随之日益模糊。在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企业有着相对明确的“国籍”,企业与国家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收益具有相对一致性,而在要素分工条件下,企业边界概念扩大,国家边界保持不变,经济全球化红利获取的不一致性因而日益凸显。虽然跨国公司通常代表着母公司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但出于资本贪婪和不断扩张的本性,其所获利益并不一定完全及时地汇回母国,可能更多地在全球各地进行再投资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因此,统计层面上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所得,并不完全反映为宏观层面上的国家利益。这种经济全球化红利上的“分离”现象,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

第三,虽然经济全球化能够创造红利,但是并非每个利益集团都能成为受益者。在要素分工条件下,资本在全球配置获得极大利润的同时,也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推向了极致。跨国公司的资本、知识精英的技术加上新自由主义推行者“铁三角”式的结合,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均构成了范围更大、程度更强、形式更多的盘剥和压榨,而使其不但没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而日益被边缘化。这对发达经济体所受影响尤甚于发展中经济体。因为在要素分工背景下的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这不可避免地要对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带来巨大冲击;而且这种转移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开展的,资本的流出意味着国内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因此劳动边际收益会随之下降。由此可见,在全球要素分工演进背景下,客观上存在着使发达经济体内部红利分配失衡的重要作用机制。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规则需要调

整,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完善。然而,现有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制机制安排以及国际合作关系格局,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是“霸权思维”下的产物,更多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利益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考虑不够。发展中国家要求完善全球经济规则和调整经济治理体系,无疑会对发达国家的惯性思维带来冲击和挑战。美国等发达国家既难以接受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国际合作关系的重塑,又无法找到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有效对策,不得不重新祭起过去曾经采用过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这是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内在原因。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素分工条件下国际利益分配关系变革的强烈呼唤

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完美地”论证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互利性,但是对利益分配问题却语焉不详,主要停留在受益或受损导致的自愿或非自愿行为选择的简单论述层面。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一国自愿参与国际分工,是因为能够从中受益,否则就不会参与而退出国际分工。实际上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即便是受损一方,也未必会选择退出国际分工,“贫困化增长”现象就是典型例证。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有些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措施。即便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协调政策,也并非是基于对其他参与方利益的考虑,而是担心可能招致严厉的报复。实践中,如何依托以及不断强化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地位,尽可能在既定的全球化红利蛋糕中切取更大的一块,已成为各参与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目标。只要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至于导致部分国家逐步退出国际分工体系,那就可以竭尽所能地攫取经济全球化红利,而根本无须顾及他国利益。这便是以往建立在市场效率基础之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逻辑。

在经济全球化演化到要素分工阶段后,这一基本理论逻辑再也站不住脚了。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条件下,由于不考虑生产要素的跨国流

动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发生在国内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并不改变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各国之间也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换言之,一国产出能力主要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开展专业化分工后,相比分工前世界总产出增长的部分,即可视为经济全球化的总利益,而且其总量一般是既定的。在既定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总量中,夺取、占领和控制更多市场以获取更多红利,并不会显性地从根本上影响到之后的分工和贸易。但是在要素分工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是红利蛋糕不再是一个既定的总量增量,而是一个变化的增量。于是,全球化红利从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的“正和”博弈,演化为要素分工条件下的“变和”博弈;二是全球化红利的创造不仅依赖于产出能力,同时还依赖于红利蛋糕的分配情况。正是由于这种深刻变化,简单以市场效率为基础的发展逻辑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就难以适应了。

一方面,从要素流动角度看,与传统国际分工不同,资源优化配置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而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显然,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引发的资源优化配置,会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因此,一国生产能力的变化不仅来源于产出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转换关系,更决定于一国生产要素与他国生产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适宜的数量匹配和质量匹配会更加有利于产出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红利,反之,则会弱化红利创造效应。因此,在要素的跨国流动中,一国自身要素数量的多寡以及要素质量层次的高低,显然会与一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能面临的发展机会大小有关,与能否获取足够的利益以支撑其发展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从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全球化配置角度看,由于要素分工的本质是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以进行全球化生产和经营,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化的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都只不过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成需要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在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任何一个阶段和环节出现问题,不仅影响着下

一阶段的生产,最终会波及整条生产链从而影响着最终产出。某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数量短缺,定会影响到下一阶段进而最终的产品产出数量;同样地,某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质量不济,也会决定着最终产品的质量层次,甚至会产生“木桶效应”。总之,无论是从要素跨国流动看,还是从生产国际分割看,各国产出之间具有了相互依赖、共生发展特征,共同决定和改变着全球产出增长能力和红利创造能力,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由此具有了“变和博弈”的特征。

正是因为要素分工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具有了上述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利益分配状况才会影响到产出能力,进而进一步影响着红利创造能力和红利获取情况。诸如“贫困化增长”等,虽然从其他参与方角度看,能够增加一时之利益,但从动态发展角度看,终会因为前者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弱化,导致全球产出能力下降,乃至因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红利总量受损反过来殃及各参与国对发展红利的获取。即便从当期考察,由于各国之间具有了投入—产出关系,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也不难理解一国产出的变化显然有赖于他国产出的变化,不难发现各国产出之间具有了相互依赖的共生性特征。适宜的利益分配有助于—国产出能力的增加,而产出能力的增加,显然会通过投入—产出的需求关系拉动他国产出增加,并由此形成往复循环的正反馈作用机制,最终有利于红利蛋糕的做大以及各参与国利益增长。反之,不适宜的利益分配关系将弱化部分国家的产出增长能力,最终导致红利蛋糕越来越小,各参与国利益增长就会受限。总之,全球要素分工、生产经营活动的全球化、生产的无国界性和全球性,将所有参与国“网络”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各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相互依赖关系。

以往建立在市场效率基础上的理论逻辑,再也适应不了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市场效率本质上并不要求考虑他人利益,而只注重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国际经济规则,对全球化红利分配也是有偏的。世界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市场效率要求的经济

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充分关注各国发展差距。由是,不公平竞争再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导致强国对弱国的盘剥与压榨。当下特朗普的所谓“公平贸易观”,一味强调“向美国看齐”,实质上是一种不公平。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等实力悬殊,片面强调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入到要素分工阶段,单纯考虑市场效率的发展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难题。人为地干预或者阻碍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协调发展的内生要求及其自发促进机制的形成,不仅有碍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反而会导致“开倒车”。

鉴于全球要素分工深刻改变着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经济全球化发展既要注重效率也不能失去道义。各国之间只有以更加相对公平的方式共享其红利,才能实现利益的不断增长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正是出于对这一变化特征的深刻洞见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和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强调“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作贡献”^[2]。这里强调的“义利平衡,道义为先”,其本质正是“合作共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践需要,顺应各国间分配关系变革的强烈呼唤,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的新思维、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必然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利共赢、共生共赢的同一根链条,要求着力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从全球经济增长角度看,这种要素分工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求世界各国在关注自身利益增长的同时,必须同时关切他人利益增长,以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平衡发展。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必将

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三、打造全球经济增长共赢链：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3]在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期,他不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其引领发展的正确理念,而且以“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明确了践行这一理念的实现路径。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不二选择。它不仅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唯一方向道路,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必然选择。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中国必将走出一条具有榜样作用的“全球增长共赢链”之路,必将占据重要国际地位,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发挥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国作用。打造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全球增长共赢链”,至少应当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去努力:

(一) 努力走主动型开放发展之路

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的必要前提是要坚持主动开放。不但要竭力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多边体制和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和范围,进一步主动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水平,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一步提升贡献所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困扰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期,这些问题愈发凸显,但这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有意或者无意地将本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进而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这是既缺乏分析问题的智慧,又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的表现。当下经济全球化已进入第三轮发展期,相应发展理念的缺失以及路径选择的疑惑,或正源于此。然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人为因素或能暂时放缓其步伐,但终究不能抵挡。正如习近平所说“世

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4]世界经济发展史早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即便是在危机冲击期间,也不宜重回封闭隔绝、以邻为壑的老路,因为这不仅不是治愈危机和衰退的良药,反而会压缩全球经济增长空间,导致双输、共输局面。唯有顺应历史潮流,努力走主动开放发展道路,才有实现增长共赢的可能。中国已向世界表明,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5],我们将继续践行主动开放并为世界做出表率。

(二) 努力走包容型开放发展之路

包容型开放发展是指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注他国的利益。与传统的效率思维模式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内生地反对发展中的“攻城略地、赶尽杀绝”。世界各国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营造和谐共赢的国际环境,以实际行动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这也是各国为自己的开放发展铺垫一条科学、和谐、可持续道路的必然选择。目前,全球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很大,南北差距问题尤为突出。巨大差距的存在不仅导致了困扰世界、久而未决的贫困和饥饿等问题,而且随着世界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也给和平和发展带来更大风险。尤其是在开放条件下,不平等竞争对国际关系造成破坏,即便是正常竞争,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给不同国家的产业和群体带来冲击。上述问题的存在,无疑是各国开放发展的包容性不够所致,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各国各地区协调、包容发展,不仅仅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唯有更加包容才能真正实现增长共赢,因此,选择“全球增长共赢链”的开放发展道路,就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包容性不够的问题,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续。

(三) 努力走共享型开放发展之路

共享型开放发展,主要是指实现更加公平的全球化红利分配机制,让开放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和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尽管我们不能对其他国家也这样要求,但主流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国际分工能使参与国都获益,自由贸易本身应该双赢。当然历史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早期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上,更表现在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凭借在国际经济治理以及产业竞争中的优势,获取了国际分工的主要收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效应,却难以体现较多获益或者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走共享型开放发展道路,这是经济全球化演进到要素分工阶段后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各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调整的现实需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证开放发展利益的现实需求。在国际经济发展环环相扣以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时代,各国经济繁荣稳定,不仅是世界经济繁荣稳定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国家之间互相构成发展机遇的决定因素。一国经济的繁荣稳定,既依赖于外部经济的繁荣稳定,同时也为外国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各国在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互利共赢”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贯主张,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4]的声明和主张,展示的正是中国将继续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走共享型开放发展之路的抉择和决心。

(四) 努力走联动型开放发展道路

联动型开放发展是指发挥各国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优势互补,形成联动发展格局。无论是包容型增长还是共享式增长,都必须在联动发展格局中实现。经济全球化演进到要素分工阶段后,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彼此之间的利益高度融合,相互依存,由此决定了各国一定会在世界经济中发生

共振,在共振中联动发展。在联动发展格局中,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但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必须置于更加广阔的层面进行考虑,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走不通,反而会损害自身利益,协调合作才是正确选择。通过有效的协调合作实现联动发展,不仅要实现硬件层面的联通和互动,还要实现软件层面的联通和互动、人文交流层面的联通和互动。因为这些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前提,也是更好发挥联动效应的关键。具体而言,联动发展首先需要在政策规则层面实现联动。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减少政策效应的负外部性放大其正外部性;另一方面,要通过沟通、交流、互鉴等,尽可能地实现政策、标准和制度的无缝对接和一致性。其次需要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基础设施的联动是其他联动的基础,是国与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实现优势互补的关键制约因素。最后,要增进民间友好互信和文化交流的人文联动。人文联动是其他层面联动的社会根基、是增进彼此间了解理解的重要渠道。上述三个层面上的联动,与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中提出的“三位一体”立体式互联互通观念和要求基本一致。唯有如此,才能增进利益共赢,最终打造出“全球增长共赢链”。

(五) 努力走更加公平合理的开放发展之路

更加公平合理是指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和完善的全球经济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国与国之间因发展差距从而竞争能力有别,竞争地位明显不同,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经济规则约束下,产生了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伴随经济全球化实践的演变和发展,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时而变。这不仅是因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他们需要与有与之相适应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话语权,同时还因为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产生了对更加合理公平利益分配机制的内生需求。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发展的需要,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未来的全球经济规则调整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应

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以开放为导向,积极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为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调整和完善献言献策,通过“广纳良言和兼容并包”,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不能继续走一家独大、几家独霸或者赢者通吃的老路,而是要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尤其关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本着寻求利益共享和实现共赢的根本目标,进行规则共商,机制共建和治理共参,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我国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6] [P135]},既表明了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需求,也说明了我们秉持的是共赢目标。唯有如此,才能为实现“全球增长共赢链”目标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对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

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坚定地走出一条“全球增长共赢链”之路,需要中国这样的有志者引领,也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演进中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作用。

参考文献:

- [1]金京,戴翔,张二震. 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J]. 中国工业经济,2013,(11).
- [2]习近平.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N]. 人民日报,2013-04-08.
- [3]习近平.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N]. 人民日报,2016-09-05.
- [4]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N]. 人民日报,2017-01-18.
- [5]杜尚泽. 习近平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N]. 人民日报,2015-03-30.
- [6]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孔陆泉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AI Xiang & ZHANG Er-zheng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uditing,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spread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have their objective basis in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caused b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ve been one of the deeper causes. Facing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of leadership,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win-win cooperation as the core, and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is gaining worldwide recognition. The new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theoretical conclusion of the practices i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heory.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dynamic,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will uphold this new concept, and work hard to take path of open development featuring initiative, inclusiveness, sharing, collaboration, and more fairness, so as to build a “win-win chain for global growth”, and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n-win chain for global growth